

## 劉少奇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52-1966)\*

鍾延麟\*\*

「文革」前的中共政治中，身兼黨第一副主席與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與黨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為毛澤東重用的領導人，兩人長期受毛委託在「一線」主持黨國的中央日常工作。著眼於對方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劉少奇對鄧小平另眼相看，鄧小平則對劉少奇維持敬重與支持。在中共重大決策與政策上，劉、鄧之間少有歧異，因為只要毛澤東表明態度，兩人皆唯命是從。然在摸索整治「大躍進」後的經濟困難上，劉、鄧默契合作，共助情勢轉危為安；兩人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向的看法，則存有要而不顯的差異。劉、鄧在「文革」前政治運作的往來中，兩人在「一線」內雖是上、下級的工作關係，但形成「信任—尊重」的互動模式。毛澤東雖在「文革」中決定將劉少奇與鄧小平一併打倒，但或因劉、鄧所居位置與各自對毛探行策略的不同，毛在對待兩

---

\* 作者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羅德明(Lowell Dittmer)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永發教授與余敏玲教授曾對本文初稿的惠予指導與評論。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聯絡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28 Academia Road, Section 2,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人上乃有所區別。

關鍵字：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二線分工、中共高層政治

## 一、前言

在「文革」前的中共政治中，在毛澤東的主導下，中共中央領導人被分作「一線」、「二線」。事實上，只有毛澤東可以依其本人的意願，機動地選擇在「一線」直接領導黨國工作，或是擺脫日常工作退居「二線」，將主要心思放在重大的戰略或意識形態問題。<sup>1</sup>劉少奇與鄧小平則是最常被毛澤東指派在「一線」前列主持工作與處理事務的兩名領導人。

劉少奇以毛澤東的首要副手與政治繼承人的身分，擔任中共第一副主席與國家主席，長期作為中共第二號的政治人物；鄧小平在毛澤東的庇護下膺任黨的中央總書記，位高權重，在中共政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這兩位曾受毛澤東特別倚重的中共要人，在「文革」伊始雙雙被冠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惡名，並被批作是有如一丘之貉、狼狽為奸的「劉鄧黨」。<sup>2</sup>

然而，無論在研究劉少奇或鄧小平的中西專著中，對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彼此之間關係的議題，迄今卻仍無系統而深度的研究。其也成為毛澤東主政時期中共高層政治與菁英互動研究的一塊空白。中共建政後至「文革」以前，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關係為何？兩人關係主要受什麼因素影響？劉、鄧兩人長期一起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特別是在所謂的「一線」內，兩人的政策配合情形如何並產生什麼影響？彼此在政治運作上如何互動？兩人同被當作「文革」首要的批判對象，但又何以在運動中受到區別對待？

---

<sup>1</sup> 關於「一線」、「二線」的安排，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自己曾作過回顧與解釋：「考慮到國家的安全，鑑於蘇聯史達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志在一線。」「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臺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1974），頁657-658。另外，有學者指出：可以選擇居於「二線」者，僅限於毛澤東一人，實際上，毛也沒有真正完全地退居「二線」，因為處於「一線」的其他領導人皆深知大權緊握在毛手裏。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July, 1995), 59.

<sup>2</sup> 「文革」中，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在審問劉少奇之妻王光美時就指控：「你們的劉鄧黨！」首都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南海長城》戰鬥隊編，《三審大扒手王光美》（北京：1967），頁5。

以上乃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

本文的論點為：「文革」前的中共政治中，劉少奇與鄧小平同為毛澤東重用的領導人，兩人長期受毛委託在「一線」主持黨國的中央日常工作。著眼於對方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劉少奇對鄧小平另眼相看，鄧小平則對劉少奇維持敬重與支持。在中共重大決策與政策上，劉、鄧之間少有歧異，因為只要毛澤東明確態度，兩人皆唯命是從。然在摸索整治「大躍進」後的經濟困難上，劉、鄧默契合作，共助情勢轉危為安；兩人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向的看法，則存有要而不顯的差異。劉、鄧在「文革」前政治運作的往來中，兩人在「一線」內雖是上、下級的工作關係，但形成「信任—尊重」的互動模式。毛澤東雖在「文革」中決定將劉少奇與鄧小平一併打倒，但或因劉、鄧所居位置的不同與各自對毛採行策略的有別，毛在對待兩人上乃有所區別。

本文的目的在於：在文獻分析並輔以訪談的基礎上，<sup>3</sup>試圖勾勒出中共建政後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的往來梗要與相處情形，冀以對中共的高層政治與菁英研究有所裨益。本文的章節安排，除前言，概有六個部份：一、中共建政初期的劉鄧關係，特別是「高饒事件」對兩人關係的影響；二、鄧小平在毛澤東扶持下權位的上升，對於兩人關係的影響；三、劉、鄧在「文革」前重大決策與政策上的同異和互動；四、「文革」前中共中央的「一線」政治運作中，劉、鄧之間的互動情形；五、探討何以劉、鄧在「文革」中雖同時黯然下台，但卻遭受不同的政治待遇。最後，在結論部分，則對鄧小平對劉少奇平反與評價問題的作為與立場，作一簡單的討論。

## 二、中共建政初期之劉鄧關係：「高饒事件」之影響

劉少奇與鄧小平在 1949 年以前中共「馬上得天下」的過程中，雖偶有接觸，但未曾有任職同一單位的共事經驗。在 1952 年鄧小平從四川上調北

---

<sup>3</sup> 本文利用作者在中國大陸與香港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為必要的補充。為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文中乃以甲、乙、丙、丁等的代號名之，並加上訪談的地點與時間。

京參加中央領導之後，劉、鄧之間方有頻仍的接觸與密切的互動。未幾，兩人的關係在經歷「高饒事件」後有重大而實質的進展。

1950年代初，劉少奇無論在重大發展戰略與具體政策問題上，屢與毛澤東有觀點上的差異。相較之下，高崗在相關問題則多與毛澤東一致或相近。<sup>4</sup>劉少奇與高崗各自在毛澤東的心中，出現一降一升的變化，毛對外也刻意營造拉高、抑劉的氣氛。

對高崗方面：1952年11月，高崗被任命為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在隔年春旨在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安排中，高崗負責國家計劃工作的同時，亦領導政務院所屬的工業相關8個部門。其鋒頭之健，蓋過鄧小平在內的其他4名同是調來中央的地方大員，時人因而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對劉少奇方面：1953年5月20日，毛澤東批評：「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sup>5</sup>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趕忙會同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起草相關的改善辦法，並提交中央決定，<sup>6</sup>以平息毛的怒氣。

再加上，毛澤東曾要高崗親自查看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的紀錄，<sup>7</sup>如此可能讓高崗進一步地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有所不耐、甚至想更動劉既有的政治權位，高自身更心生藉由代毛出面處理劉的地位問題以專榮固寵的想法。鄧小平在1980年回顧相關歷史時就表示：

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頭暈轉向。<sup>8</sup>

<sup>4</sup> 林蘊暉，《國史劄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頁71-86。

<sup>5</sup> 毛澤東，〈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5卷，頁80。

<sup>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上卷，頁303。

<sup>7</sup>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21。

<sup>8</sup>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中共官方後來指控高崗所從事的非法政治活動，主要表現在 1953 年夏天全國財經會議上的「批薄(一波)射劉(少奇)」與秋天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討安(子文)伐劉(少奇)」。因為時任政務院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安子文皆與劉少奇有共事的經歷與淵源，薄、安在各自的業務上也確實出現為人詬病的明顯錯誤，高崗與抗日時期曾與劉少奇在華東共事的中組部部長饒漱石，在批判薄、安的同時，也藉機為難劉少奇。

在此一事態發展的過程中，鄧小平屢次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表達對劉少奇的支持。例如：當全國財經會議陷入在批判薄一波的僵局之際，鄧小平發言為薄緩頰。<sup>9</sup>其與陳雲的發言，有助於將會議降溫並順利收尾，也間接抒解劉少奇在含沙射影下所承受的壓力。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糾纏於批鬥安子文而使得會議停擺之時，鄧小平發言表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是貫徹了中央的路線的」。其更著重指出：「這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是領導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sup>10</sup>在鄧小平與他人的合力下，推促會議回歸正軌並終得落幕，也緩解了劉少奇在指桑罵槐下所感受的尷尬。對於鄧小平的不吝施予援手，劉少奇自是知情，甚至曾在公開講話中引用鄧小平的話，呼籲黨內團結。<sup>11</sup>這或是劉試圖向鄧表示友好，以助改善其在高層中的孤立處境。

由於毛澤東在 1953 年底要赴杭州專心研究制定憲法的事宜，他在 12 月 15 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在其離京請假期間，應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或是由其他書記處成員輪流主持的敏感議題。針對此一議題，

---

頁 261-262。

<sup>9</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上卷，頁 251。

<sup>10</sup> 陳野蘋、韓勁草，《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 104。

<sup>11</sup> 1953 年 10 月 27 日，劉少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會講話結束時表示：「希望這一次到會的各地區黨委的組織部長同志到處提倡全黨團結一致的精神和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要鞏固全黨的團結，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鄧小平同志講了，全黨過去是團結的，今天也是團結的，那麼是不是高枕無憂了，就看不到缺點了，或者看到有些缺點而把它掩蓋起來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們的缺點，要做工作，要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 749-750。

與會者出現主張按往例由劉少奇主持與主張輪流幾近各半的情況。例如：周恩來、鄧小平認為由劉少奇主持為宜；高崗、朱德、饒漱石則主張輪流主持。<sup>12</sup>由於兩派意見不相上下，毛澤東因而裁定下次開會再議。然而，情勢未久即出現重大變化。

因為在該會結束後，高崗即為此事找鄧小平進行遊說。<sup>13</sup>鄧小平就這方面所作的回憶是：

對西南，他(高崗)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sup>14</sup>

高崗試圖遊說鄧小平一致對付劉少奇的舉動，不但沒有爭取到鄧，反而讓鄧有了反制高崗的重要藉口。因為鄧小平旋即將其所掌握與見聞的高崗的「非組織活動」(包括高私下勸鄧)，向毛澤東舉發。<sup>15</sup>由於鄧小平是按照黨內組織紀律行事，言行上令人覺得正直有理，<sup>16</sup>毛澤東對之不但沒有不受理的理由，更有因之而要從速、從嚴處置高崗以昭公信的壓力。高崗問題因此急轉直下，高也從權力的雲端跌至谷底。

鄧小平何以旗幟鮮明地拒絕高崗而支持劉少奇？首先、鄧小平對毛澤東意向的度測。高崗坐大無疑出自於毛的扶植，毛也有利用高崗與饒漱石敲打劉少奇之意。只不過，高、饒不知進退與節制而常使問題失焦，甚至耽誤了既定的工作議程。在此過程中，毛澤東每要鄧小平協助將政治方向

<sup>12</sup>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184。

<sup>1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中卷，頁191。

<sup>14</sup>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57。

<sup>15</sup> 有關鄧小平向毛澤東揭發高崗的方式，有兩種說法：一是鄧自己直接同毛說。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111. 另一是鄧先跟周恩來說，周再跟毛報告。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第3期(北京，2009)，頁35。

<sup>16</sup> 毛澤東在1960年代初期回顧此事時即評論：「從高饒問題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羅榮桓、鄧小平、陳雲。」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上冊，頁317。

予以導正。例如：交代當時養病休息的鄧小平出席全國財經會議發言以調降會議溫度；囑咐鄧小平探察饒漱石對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與會人選的想法。<sup>17</sup>鄧在其間也形成並確認毛澤東重視維繫黨內高層團結的認知。高崗過度張揚地挑戰權力現狀、影響高層穩定，也不利於毛澤東正亟思推動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戰略。因此，事態若繼續激化發展下去，恐也非毛本人所願見。鄧小平適此之時再將高崗破壞黨內團結的問題置諸毛的面前，可以對情事的演變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其次、高崗對軍方要角與地方實力派的私下說項與暗地串連，鄧小平看在眼裏也親身經歷。鄧小平當時就指控高崗、饒漱石是「這邊一炮，那邊一鬥」。<sup>18</sup>他在1980年評論高崗問題時也表示：「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sup>19</sup>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懷同志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同志。<sup>19</sup>鄧小平對高此種暗地組織隊伍圖謀推倒劉少奇的行徑不以為然，甚至成為促使他向毛澤東「告御狀」的關鍵因素之一。鄧表示：「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sup>20</sup>

再次、據鄧小平晚年的陳述，其以劉少奇的地位乃是「歷史形成」為由而回拒高崗。鄧小平尊重劉少奇「歷史形成」的地位，實際上就是訴諸並肯定劉少奇在黨史上協助毛澤東領導中共克服諸多難關與障礙的過程中所建立的黨內地位。劉少奇在1953年處於政治下風、低潮時，對自身過錯坦承不諱，對他人指正虛心受教，劉的領導威信因此不降反升。相形之下，對劉少奇猛攻不止的高崗，其動機則引人疑竇。鄧小平就認為高崗居心不

<sup>17</sup>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91、296。

<sup>18</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326。

<sup>19</sup>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100。

<sup>20</sup>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頁257。



良，懷有去劉而代之的謀略。其 1980 年初白首憶往時表示：「毛主席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裡就在考慮一線、二線問題。高崗就是在這件事上出了問題，他要搶這個一線。」<sup>21</sup>更何況，高崗行徑乖張、易落人話柄。此次他若順利得手，規範蕩然、難有寧日。在劉少奇與高崗之間做選擇，鄧小平是有意識地抵制、揭發高崗，堅挺劉少奇。以倒劉為號召並自命前鋒的高崗，遭鄧檢舉、政治上宣告出局後，毛澤東短時間內也不好再繼續刁難劉少奇，以免給人他與高在整劉問題上是沆瀣一氣的觀感。

在「高饒事件」中，鄧小平對劉少奇的「保位」之戰的相助，並不僅止於此。因為在毛澤東將高崗、饒漱石的問題「拋出」後，劉少奇與鄧小平的任務就是調查與認證高、饒的「反黨罪行」。在這方面，先前苦受高崗打擊的劉少奇與作為揭發高崗問題之關鍵證人的鄧小平，可說是合作無間。這或也緣於在讓高崗政治徹底破產、永不翻身以免他來日挾怨報復的個人利害考量上，兩人所可能有的高度共識。劉、鄧偕同其他高幹對高崗與饒漱石分別進行約談；劉、鄧也共同籌劃舉行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高、饒進行不點名批判。引人側目的是，鄧小平在全會中所作的題為《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的發言中，特地為此前在高、饒衝擊下不免受到磨損的劉少奇的領導威信，加以高調辯護與頌揚。

鄧小平強調：「有些同志不注意維護中央的威信，對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有些已經發展到黨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我們能夠把維護中央的威信和維護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威信分開嗎？能不能這樣說，維護中央的威信與中央幾個主要領導同志無關，例如與少奇同志無關，是否能夠這樣解釋呢？」<sup>22</sup>另外，針對高、饒在 1953 年對劉少奇交加指責的諸項問題如「天津講話」，鄧小平也一一加以解釋與澄清，雖然鄧實際上也覺得他們所指並非全無道理。<sup>23</sup>對於鄧小平在講話中有如寒冬送暖般的毅然相挺，劉

<sup>21</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上冊，頁 603-604。

<sup>22</sup> 鄧小平，〈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卷 1，頁 206。

<sup>23</sup> 1980 年 3 月 19 日，鄧小平就坦承：「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如土改時搬石頭、反五大領袖；天津講話，還是有缺點錯誤。」趙

少奇將之牢記在心。高崗大做文章的「天津講話」問題，劉少奇在「文革」中又再次受到質問，劉猶堅稱：「毛主席說講的好，小平同志也說對他們渡江以後沒有犯『左』的錯誤有很大幫助。」<sup>24</sup>劉少奇所言的鄧小平的意見，就是出自於鄧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

針對饒漱石的問題，鄧小平受命主持實質為面對面批鬥的座談會。鄧最後對饒漱石作的是「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結論。<sup>25</sup>對劉少奇而言，鄧小平或也算是代之懲治背叛自身的門徒。

在「高饒問題」轉入組織處理的階段後，1954年4月，鄧小平同時獲任為掌控訊息流動的中共中央秘書長與組織事務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而此二職向為劉少奇本人或其人馬所執掌。<sup>26</sup>鄧小平的相關職務任命甚為重要，如不是毛澤東主導，也勢必得經過毛的認可才行。毛在其中或有意藉此人事安排瓜分劉少奇原有的權力並對之進行箝制。然而，劉少奇對此似無太大的惡感。甚至有資料指稱：劉少奇可能正是琢磨毛澤東心意下提議鄧小平出任中央秘書長的人。<sup>27</sup>影響劉少奇態度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幫助劉化解政治危機並因此取信於劉。劉的妻子王光美在晚年也表示：「高饒事件」實是對劉、鄧關係的一次重要考驗。<sup>28</sup>事實上，其也為劉、鄧在之後的政治合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 三、鄧小平權位上升對劉鄧關係之影響

在「高饒事件」引發的政局動盪大勢底定後，鄧小平的仕途有如平步青雲：除了前述的鄧小平在1954年獲任為中共中央秘書長，1955年中共

---

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262。

<sup>24</sup>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355。

<sup>25</sup> 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頁283。

<sup>26</sup>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8.

<sup>27</sup>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117.

<sup>28</sup> 王光美，〈王光美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56。

七屆五中全會，鄧又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鄧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更一躍成為中共中央最高的決策機關政治局常任委員會的一員，並以中央總書記的身分領導新設的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是鄧小平短時內在中共黨內「搏扶搖而直上」的最大推手。毛澤東為了幫鄧小平造勢、宣傳，以助之順利取得「八大」規劃的新職，不惜唇舌地向其他高幹強力推薦鄧小平。除了在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國內領導層間為鄧小平美言、擺好，毛澤東甚至曾在 1957 年訪蘇聯期間，針對在他之後的中共國家主席的後繼人選問題，在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面前將鄧小平與劉少奇等中共主要領導人進行評比。其中，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評價還比劉少奇高。毛澤東指出：劉少奇「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相形之下，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難得的人才」。<sup>29</sup>赫氏晚年回憶時也表示：「他(毛)對劉少奇和周恩來談些什麼，我記不確切了，但他不喜歡他們兩人中的任何一人。」「毛所稱讚的他們的唯一的同志是鄧小平。我記得毛給我指指鄧說到：『看見那邊的矮子嗎？他非常聰明，並且有著遠大的前途。』」<sup>30</sup>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厚愛有加並且不吝在公開場合內表達，曾在中共黨內引發私下的議論，特別是毛如此高抬鄧小平，是否會觸及到劉少奇作為毛澤東一人之下的「二把手」的地位。1959 年 4 月 5 日，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當著劉少奇與鄧小平與其他黨內高幹面前表示：

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兩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我向你們要求這個權力，要你們通過。

要當秦始皇，當秦始皇就要辦事，先在常委、書記處討論，我和鄧小平掛帥，鄧小平你掛了沒有？你敢不敢？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

<sup>29</sup>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169。

<sup>30</sup> 赫魯曉夫，李文政、王君如等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武漢：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上冊，頁257-258。

也是常委會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不過你還是相當硬的，中央委員會那麼多人怎麼找到鄧小平呢？還是我找為好。<sup>31</sup>

對於毛澤東的相關言語，楊尚昆後來回憶就表示：「這樣劉少奇擺到哪兒去呵」，「開完會回來，大家都議論，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呵，當然誰也不好去問。」<sup>32</sup>賀龍在耳聞毛澤東相關言論後，私下也曾向朱德詢問：鄧小平若作為「副帥」，劉少奇的地位又如何？<sup>33</sup>旁人若有此疑惑，作為當事人的劉少奇又會作如何想呢？約此前後，劉少奇正被提名接替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毛突然在言詞上封鄧小平為「副帥」，或正是拉抬鄧向劉示警，以讓後者懷有戒慎疑懼之心，不要自以為未來在繼承毛的大位的問題上，已勝券在握、無有變數。

根據目前所得的資料，劉少奇對於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寵愛與看重，甚至在權力制衡上可能有針對他自身的含意，不敢有所非議或表示不同意見；相反地，劉少奇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後屢次表達其對毛澤東重用鄧小平決定的支持。例如：當毛澤東勸說鄧小平出任中央總書記，劉少奇也在旁加以助陣、動員，要鄧接受該職。<sup>34</sup>之後，有關鄧小平擔任的中央總書記相關職責，以及中央書記處的性質問題，劉少奇也曾為之進行說明和宣傳：「我叫大家崇拜鄧小平，叫書記處多負點責任。不能把書記處當成過去的秘書處性質的單位。我叫大家崇拜一下鄧小平(他年紀比較輕一點)，叫他掌舵，多掌管一點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情。」<sup>35</sup>

1957 年 5 月，劉少奇在一篇基於其談話整理而成並經其審定的社論中，

<sup>31</sup>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下卷，頁465-466。

<sup>32</sup>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頁36。

<sup>33</sup> 朱德倒不失機敏地以劉少奇也是副帥回應賀龍。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8.04)

<sup>34</sup> 據劉少奇秘書的回憶：在毛澤東勸說鄧小平出任黨中央總書記一職時，鄧小平以「我的威望與能力都不行，怕難以勝任，還是讓別人當吧」為由婉拒，在旁的劉少奇也對鄧小平做工作，並表示：「主席，我看就這樣定了吧！」毛澤東隨即表示：「好，定了！」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頁42。

<sup>35</sup>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69。

讚揚鄧小平為早年留法勤工儉學的青年中「最優秀的代表人物」之一。<sup>36</sup>1959年9月9日，也就是毛說要鄧「掛副帥」的5個月後，劉少奇在北京出席旨在向軍中傳達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決定並肅清彭德懷、黃克誠在軍隊影響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在題為「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和「關於所謂個人崇拜問題」談話中，也不惜以黨內上級、前輩的身分，對軍方高級將領表示要搞鄧小平的個人崇拜：「我這個人歷來是提倡『個人崇拜』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sup>37</sup>

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所說的毛澤東以外可作為個人崇拜的對象，並沒有周恩來、陳雲、朱德，而是黨內名義排名在他們之後的林彪(1958年中共八屆五中全會，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與鄧小平。劉無提及自己，則應主要出於自謙，以及吹捧自己所可能引發的政治敏感。劉少奇揚言鼓吹對鄧小平與林彪的個人崇拜，實質反映出其伴君多年下所做的觀察與體會，亦即鄧與林乃是毛澤東所看重與偏愛的對象。<sup>38</sup>劉少奇不過是道出、順應毛澤東心中所想。

綜上所述，劉少奇對於鄧小平一路看漲的「官運」勢頭，不橫加指點，更惠予輿援、響應，其原因雖同時可能也包括：劉少奇基於識才、愛才心理，如能讓作為黨內才俊、中壯之輩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領導團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形同灌入新血，既可壯盛領導陣容行列，也可以起到減輕益加繁重的中央領導工作的作用。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對劉少奇的聲援，劉自也會思投桃報李。鄧小平享有的戰功以及其與軍方的聯繫，也可在未來補強劉少奇同軍隊關係稍嫌薄弱的不足。<sup>39</sup>但劉少奇最主要的考量，恐怕

<sup>36</sup> 〈提倡勤工儉學，開展課餘活動〉(1957年5月5日)，湖南省檔案館編，《情繫故鄉：劉少奇回湘檔案史料輯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57-58。

<sup>37</sup> 劉少奇，〈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北京：內部發行，1967)，頁103。

<sup>38</sup> 關於毛澤東最喜愛林彪、鄧小平兩人一事，在當時中共高層並非一新聞。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即曾跟李銳表示：毛澤東最看重的兩個人是林彪與鄧小平。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74。

<sup>39</sup> Li Tien-min, *Liu Shao-ch'i: Mao's First Heir-apparent*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還是推動鄧小平背後的力量——毛澤東。

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綿延多年、長期形成的毛對鄧悉心提攜、鄧對毛效忠不貳的「政治扈從」(political patronage)關係，<sup>40</sup>長年處於政治核心的劉少奇知之甚詳。毛澤東對其與鄧小平之間特殊政治關係的持續經營，進一步地表現毛澤東在組織上對鄧小平的迭次拔擢。劉少奇若半路跳出充作鄧小平仕途的「攔路虎」，或是對地位持續攀升的鄧小平視若無睹，無異會將自己直接陷入與視鄧為「愛將」的毛澤東作對、相衝的處境。相反地，順水推舟，共襄舉才，反而可獲得提拔後進、不計得失的稱譽，既可避免讓毛澤東對之留下一擅權、有私的負面印象，也能進一步地鞏固其與鄧小平的友誼與關係。

劉少奇對鄧小平權位上升、向己逼近，表現得不以為忤、甚至是樂觀其成。鄧小平有否因自身在毛澤東顧佑下地位的突然崛起，而影響其看待劉少奇的態度？

對鄧小平而言，劉少奇參加、從事中共革命的資歷資深外，最重要的是劉在中共黨人之中所具有的形象：長期作為毛澤東的搭檔夥伴，成功對抗黨內的錯誤路線與勢力，並將中共起死回生、導入正途；<sup>41</sup>在意識形態詮

---

relations, 1975), v and 81.

<sup>40</sup> 鄧小平屬於毛澤東的「國王人馬」，在中共黨內乃是眾所週知的事實。鄧小平在1930年代初在江西蘇區，因被視作支持毛澤東政策主張的「毛派份子」——「鄧、毛、謝、古」而飽受批判、打擊，被降級使用，妻子也因此離棄他。然而，這卻「壞事變好事」，成為鄧小平與毛澤東建立關係的基礎。而這層關係對於鄧小平後來的政治命運與際遇有極大的正面影響。因為毛澤東在政治上抑鬱不得志之時，鄧小平因為支持他也「靠邊站」，這由毛看來，鄧是因之代過、受罪，性好憶往念舊(也記仇)的毛，對鄧因而有一特殊的情感，並且將之看為自己真正的值得信任的門生。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高層曾多次回顧相關歷史。例如：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1933年反鄧、毛、謝、古『右傾機會主義』的一篇文章，實際上是指雞罵狗的。」傅伯言、余伯流，〈鄧小平與中央蘇區的反『羅明路線』〉，全國鄧小平生平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鄧小平百週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1743-1744。在抗日戰爭時期與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任命鄧小平出任重要的黨軍職務，鄧的表現也確實未讓毛澤東失望；作為回報，鄧小平也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表示效忠。

<sup>41</sup> 1943年11月初，薄一波在延安首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對之表示：「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薄一波，〈劉少奇的功業永垂青史〉，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2000)，頁22。

釋上，劉少奇也作為毛以外另一能對理論置喙並做出「貢獻」者。劉少奇在中共建政前，已與毛澤東形成「政治聯盟」的合作關係。鄧小平在中共入主中原前，就將劉少奇視為黨內上級，對之予以款待、<sup>42</sup>接受其指揮、並向其匯報、商談工作，<sup>43</sup>對劉格外地予以敬重。

中共建政後、特別是鄧小平個人「上京趕考」後不久，他即以尊重劉少奇的「革命地位」為由，在「高饒事件」中挺身支持劉少奇。俟鄧小平躋身中央領導核心後，其對劉少奇敬重的態度不但如昔，也化為具體的行動。鄧小平 1956 年初到中央書記處履職，即提議同劉少奇歷史淵源深、並受之欣賞的彭真，專職全心於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其後鄧在主持書記處時也甚為倚重彭真。<sup>44</sup>鄧小平或有藉此向劉少奇表示，其尊重劉在「朝中」的既有影響力。

在 1959 年中共國家主席改選的問題上，有資料指稱：鄧小平表態提名劉少奇。國家主席雖屬榮譽性質的職務(特別是在以黨領政的中共政體)，但是因其畢竟代表一國之首，而且自設立以來即由毛澤東出任，其仍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義與影響力。毛澤東主動辭去國家主席後，應由誰接任的問題，按中共黨內論資排輩的標準，劉少奇接任該職應是順理成章。然而，在毛澤東沒主動表示意見以前，若過於積極表態支持某人，或有可能引發毛猜忌之虞。因此，當中共高層對此開會進行研商，在毛澤東沒說話以前，與會者皆不願表態而出現僵局，鄧小平卻不顧忌諱、打破緘默表示：「都不提，我提，劉少奇。」<sup>45</sup>此事若屬實，可以反映出鄧小平對劉少奇在中共黨

---

對於劉少奇在中共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82年4月27日，鄧小平向北韓領導人金日成表示：「劉少奇實際上是我黨白區工作的負責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819。

<sup>42</sup> 鄧小平曾對其女兒表示：1942年9月，劉少奇由華中回延安的途中經太行地區時，在赤岸的一二九師師部，他與劉伯承請劉少奇吃飯，吃的東西只有乾羊肉。鄧表示：「那是當時最好的東西了，我們很久沒吃肉了。」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臺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415。

<sup>43</sup> 據王光美回憶：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過程中，小平同志到少奇同志辦公室，談了很長時間的話。」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61。

<sup>44</sup>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220。

<sup>45</sup> 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2001)，頁311。

內享有「毛之下，眾人之上」地位的直率認同與膽敢表達。

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期間，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兩個問題的說明(要點)——關於經濟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的報告中，對於何以應由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的問題加以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作鄧小平支持劉少奇出任該職的心理與想法。鄧表示：

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做，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做，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sup>46</sup>

鄧小平對劉少奇作為毛澤東的第一助手與黨國第二號領導人的信服，也可以從次年發生的事例看出。1960年前後，由於中共在國際上與蘇聯關係緊張，國內又出現經濟困難，棘手問題甚多，毛澤東備受壓力、心情沉重，以至影響睡眠。同年8月10日，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出於對毛澤東健康的愛護，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表示：「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我們處理了」、「小事就不要過問了」。鄧小平的建議，為毛澤東接受。<sup>47</sup>毛澤東有事請假時，由劉少奇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已成不成文的慣例。此次鄧小平主動提出劉暫代毛職，雖也只是根據既往的做法而來。然而，這也顯露出鄧小平對劉少奇作為毛澤東副手地位，所抱持的理所當然的態度。

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名將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時，公開對外宣稱：劉少奇「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sup>48</sup>此外，1960年代初，毛澤東在其第4卷《選集》編輯完畢後，指示整理、出版劉少奇的《選集》，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負責對之具體規劃、

<sup>4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冊，頁837。

<sup>4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090-1091。

<sup>4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73。



安排人力並審定內容。<sup>49</sup>鄧小平因而更加確認劉少奇作為繼毛澤東之後的黨國領導人的地位，並以下事上地全心予以輔佐。

#### 四、劉、鄧在「文革」前重大政策中之協作

「文革」時，劉少奇與鄧小平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亦即他們歷年來處心積慮地推行一系列與毛澤東主張背道而馳、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方針與政策。譚震林在 1967 年 2 月 8 日接見所謂的「革命造反派」時，就使用時興的政治語言表示，在 1960 年至 1966 年，「每逢雙數年是劉、鄧反動路線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攻最厲害時期」。<sup>50</sup>

然而，在「文革」以前，劉少奇與鄧小平在政策上的互動與關係，實際狀況並非如此簡單與化約。一方面，劉少奇與鄧小平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對毛澤東的領導既有打從內心的信服，也有擔心不依從就會受懲的恐懼。<sup>51</sup>當毛沒有特定看法或定見時，其他領導人可以表達自身的政策偏好並從事遊說；但一旦毛清楚地闡明其立場後，盡快跟上、跟進是其他領導人明哲保身之唯一抉擇。<sup>52</sup>劉少奇被打倒後軟禁在家時，針對說他另行其道與毛對抗的指控，就忿忿不平地表示：「我絕沒有反過黨，沒有反過毛主席」，「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幾十年裡，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有！但沒反過。」<sup>53</sup>另一方面，劉少奇與鄧小平對若干重大政策，有不同的參與程度與

<sup>49</sup>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276、282。

<sup>50</sup> 〈周總理和譚副總理接見江蘇省革命造反奪權委員會赴京代表講話紀要〉，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北京：1967.03），頁48。

<sup>51</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Politics of an 'Un-Maoist' Interlude: The Ca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1956-1957,"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7), 177-178.

<sup>52</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228-229.

<sup>53</sup> 劉平平、劉源、劉亭亭，〈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190。

角色作用，兩人之間也非事事心心相印、「鐵板一塊」而無任何政策思路上的差異。以下即從中共「八大」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來觀察。

當毛澤東主要待在中共政治舞台的幕前，直接指揮「一線」領導人之時，劉少奇、鄧小平在「一線」自主活動的空間，就相較大為縮減。因為劉、鄧此時工作主要的依循對象即在於毛澤東，亦即主要聽命於毛。劉少奇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毛澤東主導的「大政方針」加以「完善補充」；<sup>54</sup>鄧小平除參與劉主持的會議外，更多的是領導中央書記處負責對之進行「具體部署」。<sup>55</sup>在此情況下，「一線」內共事的劉少奇、鄧小平，如唱雙簧地為毛澤東的決定加以背書、兌現與貫徹。這在「大躍進」運動與政策上，表現最為明顯。

在 1956 年中共「八大」前後，領導政府與經濟工作的總理周恩來，針對經濟建設過急與投資過熱的問題，主張「反冒進」。劉少奇對此表示認同與支持，在其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制定了「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對此政策，鄧小平參與不深，但從其當時言論來看，其亦傾向支持。<sup>56</sup>1957 年中共展開整風、「反右派」運動。鄧小平在運動主軸轉為「反右派」後積極地充當獵捕異議分子的先鋒；<sup>57</sup>相形之下，劉少奇雖同是參與相關中央決策，在公開的場合也高聲抨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sup>58</sup>但總體而言，他對此政治運動涉入較少。<sup>59</sup>

先前對「反冒進」隱忍未發的毛澤東，利用「反右派」造成的緊縮的政治氣氛，從 1957 年底開展對「反冒進」政策及其主張者的批判，<sup>60</sup>並藉

<sup>54</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觀點。(北京，2008.04)

<sup>55</sup> 此出於：1958年6月8日，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下卷，頁1396。

<sup>56</sup> 鄧小平，〈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鄧小平文選》卷1，頁264-265。

<sup>57</sup> 鍾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4期(臺北，2007.12)，頁87-116。

<sup>58</sup> 劉少奇，〈在北京各界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4-10。

<sup>59</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8.04)

<sup>60</sup>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此為其所喜好之講求「多、快、好、省」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出場鳴鑼開道。周恩來為「反冒進」錯誤一再檢討，劉少奇與鄧小平則轉換想法以緊隨毛澤東。特別是劉少奇，或要挽回其先前曾支持「反冒進」而在政治上可能的失分，他除了正色指正周恩來的錯誤，<sup>61</sup>也開始積極地投入追尋「烏托邦」的綺夢。例如：1958年7月5日，劉少奇表示：「現在趕上英國不是10幾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15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產主義。」<sup>62</sup>同年仲夏，劉少奇更曾對來訪的赫魯雪夫誇口表示：「我們現在大躍進，糧食產量特別多，現在發愁的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糧食多了怎麼辦。」<sup>63</sup>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民大煉鋼鐵和農村興辦人民公社。會議期間，劉少奇與鄧小平講話調子如出一轍，就是協助闡釋、推銷毛澤東的政策主張。例如：8月19日，為保證毛澤東屬意的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劉少奇表示：在全國計劃之外，不能再有其他活動，全國是一本賬，一盤棋。不應該有不列入計劃的經濟活動。鄧小平則說：現在不是統死不統死的問題，恐怕要統點死，就是要「全國計劃，集中統一，共同負責，全民保證。」<sup>64</sup>8月23日，論及人民公社時，劉少奇表示：公社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層政權的組織形式。鄧小平也說：公社本身是社會主義性質，為共產主義作準備。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sup>65</sup>鄧小平晚年論及「大躍進」錯誤的責任所屬時，就將劉少奇與其自身並列，認為彼此都因「隨毛起舞」而難辭其咎。鄧表示：「『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

---

93-95.

<sup>61</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提供的資訊。(臺北，2009.07)

<sup>62</sup> 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頁30-31。

<sup>63</sup> 〈訪李越然——毛澤東說，涉及主權的問題不能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話說毛澤東——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34。

<sup>6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32。

<sup>6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34-835。

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sup>66</sup>

在「大躍進」中，劉少奇與鄧小平等「一線主將們」（劉少奇之子劉源的用語），經常聚集於劉少奇的住處，時而開會議政策正事、時而聊天談運動軼事。<sup>67</sup>由於保持音訊暢通並頻仍交換意見，劉少奇與鄧小平在此過程中，也亦易形成對運動問題與走向的共識。然而，縱使劉少奇與鄧小平對運動相關政策逐漸有較清醒的思考，但是在毛澤東率先出手對運動進行降溫與調整以前，他們皆不敢越雷池一步，至多利用手中職權對運動稍作微調，以免逆鱗。後來正是在這問題上惹禍上身的彭德懷，其之所以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不說不快、進而奮筆疾書的重要原因，據其「同夥」周小舟的說法，彭即認為：「中央常委之間，少奇同志當了國家主席之後更不便說話，恩來、陳雲同志犯過錯誤不能說話，朱德同志意見較少，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了解情況不多，不甚說話，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說。」<sup>68</sup>

導致「大躍進」從糾「左」逆轉成「反右傾」的廬山會議，劉少奇在會議的初期著重在思考解決「大躍進」出現的問題，但是當毛澤東決定整肅彭德懷，劉也加入批彭的火線中。至於鄧小平，在會議舉行前即在北京跌傷，並無參加會議。但鄧對於會議批彭的發展與結果，並無特別的異議。劉、鄧繼續尾隨毛高舉「三面紅旗」，在1960年繼續高唱「躍進」讚歌。

在這種「唯毛是從」情況下的劉少奇、鄧小平的政策協作經驗，其對雙方關係造成的影響，自然不如兩人在「大躍進」後為扭轉經濟頹勢，共處「一線」進行政策摸索與配合的共同經歷來得深刻。

浮想連翩的「大躍進」造成嚴重的「三年困難」，讓原本雄心萬丈的中共領導層一時坐困愁城。毛澤東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抑或是想更集中心思於如何突破困局，他更多的時間待在「二線」，暫作「甩手掌櫃」，而讓劉少奇、鄧小平在「一線」主持工作。

「大躍進」造成的問題堆積如山，相關應付工作又極其繁重，在「一

<sup>66</sup>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頁260。

<sup>67</sup>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頁138。

<sup>6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1188。

線」的劉少奇、鄧小平沒有迴避的空間，只有正視的義務與責任。由於毛澤東本身都在思索、尚無法向其黨人提出明確的方向，所以一時沒有特定的態度與立場，他也較少對「一線」領導人直接發號司令、比手畫腳。在1962年上半年探索政策選項的過程中，劉少奇、鄧小平不同於早先的事事「以毛為瞻」，而有更大的嘗試餘地。劉、鄧既在時間、情勢的急迫壓力下，有迅速反應、處置的需要性；又鑑於中共先前政策偏差導致紛亂，以及「當家作主」首重穩當的「角色意識」，而會較傾向於以保持黨國正常運轉、政經發展穩定為優先。<sup>69</sup>這與毛澤東更重視政策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意涵與後果不同。連帶地，同在「一線」工作的劉、鄧二人，也須得為他們自己推出的政策後果一起負責，形成共負政策得失的「共同利益」。<sup>70</sup>劉少奇與鄧小平在這方面的通力合作，正可見於兩人在經濟調整上的步調一致。

對於「大躍進」所造成的危害，劉少奇在1961年親赴其湖南家鄉調查之後，眼見農村基層的生活凋敝與人心不滿，<sup>71</sup>對於問題的來源有更深的體會，認為「根子還在中央，不過到了下邊就加油添醋了」。<sup>72</sup>劉少奇既要求其鄉親將「大躍進」的教訓「刻成碑，記上帳，傳給子孫，永遠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sup>73</sup>也因自己參與其中的中央領導無方而深感愧疚，甚至認為此事有損其自身的歷史名聲與評價而悲憤地一再表露「我當主席，出了這種事情」的心聲。<sup>74</sup>劉少奇當時對國內的嚴峻形勢甚為擔憂，甚至曾表示：「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台，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sup>75</sup>其期望藉由採取大刀闊斧的措施來制止惡化的情勢，使之盡快走出谷底。

<sup>69</sup> 劉源即表示：「劉少奇的實事求是，更多來自一線工作的具體實踐，經濟要運轉，人民要吃飯。」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頁4。

<sup>70</sup>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212.

<sup>71</sup> 劉少奇胞姐因飢餓而臥病在床，其姐夫因過度飢餓後突然飽食而死。當地鄉民甚至當劉少奇的面表示：「你們這麼幹，不怕農民打扁擔嗎？」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頁149、151。

<sup>72</sup> 〈同炭子冲農民的談話〉(1961年5月7日)，湖南省檔案館編，《情繫故鄉：劉少奇回湘檔案史料輯錄》，頁71。

<sup>73</sup>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頁157。

<sup>74</sup> 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座談會上的講話〉，1960年6月10-11日。轉引自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頁143、147。

<sup>7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29。

劉少奇對問題的分析，鄧小平心有同感，並引用劉的判斷。1961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大躍進」問題叢生的主因表示：「三年來毛病出的很大，問題相當多，……究竟是由於天災還是人禍？少奇同志也講過，恐怕我們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災不是主要的。」<sup>76</sup>

1962年1至2月，中共中央舉行旨在檢討「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與鄧小平在會上分別代表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承擔中共中央對運動問題應須負起之責任(要強調的是，以「責任政治」的標準來看，其仍僅止於口頭上的負責，而無真正地政治究責)。以劉、鄧在運動實行過程中確實賣力來看，他們在此會上所持的檢討立場，確有正視部分事實的一面；在政治上，兩人如是行之，亦有為運動肇禍的始作俑者毛澤東起到扛責、開脫的作用。劉少奇與鄧小平的「共患難」還表現在：鄧小平申明其領導之中央書記處須首要對中央工作中所發生的缺點錯誤負起責任，劉少奇則強調鄧與書記處所檢查的問題中，有些事項當初乃經劉代毛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所認可，不能統由書記處獨自負責。<sup>77</sup>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結束後也很信任鄧小平，要他一起整頓危局。1962年初，針對當時中國大陸經濟情勢的危急局面，心急如焚的劉少奇指出：「處在非常困難時期，不能按常規辦事」，「要搞點非常措施，同意搞財經小組，有時xx抓、小平抓、我抓，硬是要搞獨裁。」<sup>78</sup>易言之，劉少奇認為，在此緊急階段，鄧小平與其自身同是可行使大權的「一線」內領導人。這其中既包括劉少奇知曉鄧小平在毛澤東心中的分量，當然也有他在與鄧共事過程中，對於後者工作能力的了解與肯定。鄧小平在此一時期的表現，也確實不失劉少奇所望。

<sup>76</sup>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05。

<sup>77</sup> 吳冷西，《回憶領袖與戰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頁143、151。

<sup>78</sup> 劉少奇表示：「昨天陳(雲)提現在是恢復時期，是否如此，估計一下，現在和49年不一樣，我看總不是平常時期，可否說這是類似非常時期。為了解決天災人禍，要有緊急法令。現在我們的確處在非常困難時期，不能按常規辦事。……要搞點非常措施，同意搞財經小組，有時xx抓、小平抓、我抓，硬是要搞獨裁。」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近代革命研究所編印，《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匯編》(北京：1967)，頁103。

1962年2月與5月，劉少奇先後主持中央會議，重估了當時的經濟情勢，認為實情比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所設想的更為嚴重。劉少奇主張：中央政治局應該用最大的決心，採取非常的措施。鄧小平則從補充劉的角度表示：「決心早就下了，就是不夠大，更重要的問題，不是決，而是行」，「現在主要問題是行的問題」。<sup>79</sup>鄧小平的果斷、力行，更表現在其能在如麻的國事中理出頭緒。為儘速擺脫危機並恢復經濟，鄧小平強調中心工作在於：精簡人事、壓縮城市人口以減輕供糧壓力，以及抓緊生產隊工作以振興農村生產。對於先前在政治運動中遭錯判者的甄別平反，鄧也認為牽連者眾，影響工作與生產情緒甚巨，要從速辦理。對於鄧小平直指問題核心並明列工作優先順序，劉少奇從善如流、悉數接受，更提出「調整時期的英雄比大躍進的英雄更受黨的賞識」以共勉。<sup>80</sup>

薄一波曾評論：「6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為恢復和調整國民經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實際上他那時候是黨的總書記，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總書記就是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的。」<sup>81</sup>鄧小平對於當時劉少奇主持下的經濟調整工作，確實做到有力支持、參謀獻策與積極貫徹。對於在這一時期劉少奇帶頭領導、其本人參與其中的結果，鄧小平也是予以肯定。1962年8月，北戴河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回顧該年上半年的調整政策時指出：現在的情況比較好轉了，證明當時採取的措施是對的。<sup>82</sup>鄧小平在1980年代對當年經濟調整的奏效仍回味不已。

劉少奇與鄧小平在經濟調整時期於「一線」內協力推動的若干政策或倡議如：分別被毛澤東斥為「翻案風」的甄別平反工作與「單幹風」的包產到戶主張。在1962年夏毛澤東高舉階級鬥爭的政治氛圍下，難以為繼、甚至不得不嘎然而止。但是毛澤東並未因此忘懷，他在1966年8月5日的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指責劉、鄧此段時間所為乃

<sup>79</sup> 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頁336。

<sup>80</sup>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下冊，頁171-172。

<sup>81</sup> 薄一波，〈薄一波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頁149。

<sup>82</sup> 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頁344。

是「1962年的右傾」錯誤。然而，劉、鄧兩人這段契合、縝密的合作，以及他們對斯時經濟轉危為安的出色表現與正面影響，後來成為中共官方津津樂道、大為宣揚的歷史篇章。

按照傳統「兩條路線鬥爭」(Two-line struggle)有失簡化與偏頗的論述：在「一線」內，劉少奇的領導都是偏右保守；鄧小平事事都認同劉少奇。然而，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簡稱為「四清」)上，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則存有要而不顯的歧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乃毛澤東基於階級鬥爭思維，有感於前一時期黨內、外所出現的背離社會主義的做法和現象而決心發動。劉少奇在1964年後半年受命領導該運動，他對當時農村基層政治情勢與幹部問題過於悲觀的估計，較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劉少奇接下毛階級鬥爭的大旗後，對運動所採取的更為激進的主張與做法，鄧小平就有所保留。

在劉少奇接掌、指揮「四清」以前，中共中央首先在毛澤東的主持下於1963年5月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根據運動初步開展後的經驗與問題，同年秋，鄧小平與譚震林又主持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鄧小平主張「運動要謹慎」，並指出「如不警惕，打擊面可能大了」。<sup>83</sup>在《後十條》的規定與引導下，群眾在運動中的角色與自主活動空間，被附加更多的限制與規範，亦即強調運動在執行中必須保持謹慎，對不法幹部的處理要經合法的訴訟程序。<sup>84</sup>

然而，劉少奇對「四清」的方向卻有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想法，而其正以批評《後十條》的方式呈現。1964年5月28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中央局負責人會議上指出：「《後十條》強調發動群眾不夠，比較多地強調依靠基層幹部，強調團結兩個95%。於是，基層幹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幹部，就拿團結兩個95%來反對『四清』。」<sup>85</sup>劉少奇對《後十條》的批評，還僅不止於其觀點與內容，他言詞的炮火甚至朝向包括鄧小平在內的

<sup>83</sup>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74。

<sup>84</sup> 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57-59.

<sup>8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冊，頁958-959。



《後十條》制定者。例如：是年9月16日，劉少奇表示：

杭州會議，毛主席搞了第一個十條，這本來是很好的，去年上半年又搞了第二個十條，那個第二個十條就反映很多基層幹部的意見。什麼依靠基層組織，依靠基層幹部，一切要經過基層，公社黨委、支部書記要參加工作隊的領導核心，工作隊只當參謀，基層幹部當司令，淨是他們的意見，反映到中央的第二個十條上。中央開了一次會，說要根據社會主義教育試點的經驗來起草這個第二個十條，而參加會議的人士大概自己都沒有下去的，自己沒有去蹲點的，也是聽了匯報的，這樣集合各種意見，還不是基層幹部的意見？貧下中農的意見就反映不上來，群眾的意見反映不上來，基層幹部的意見就反映上來。<sup>86</sup>

對於劉少奇針對《後十條》的嚴厲批評，鄧小平多少恐感到不是滋味。<sup>87</sup>但由於劉少奇指揮「四清」乃經毛澤東同意，中央書記處會議也曾對此做出正式決定。劉少奇主持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修正草案》)在同年9月出爐，鄧小平尊重劉少奇作為其上級的地位，努力配合劉對運動新走向的指示，以及其飭令中央書記處組織各級幹部參加運動的要求。<sup>88</sup>

鄧小平對劉少奇的「四清」運動主張的保留意見，要直至1964底毛澤東將他自己與劉之間對運動的分歧與不滿形諸於色後方表明。1964年12月20日，鄧小平認為對涉有不法的基層幹部的處理，宜限縮在小範圍。鄧表示：「這次運動的打擊面還是百分之幾比較有利。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幹部，在鬥爭中分化他們，爭取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最後的打擊面是百分之幾。」對於劉少奇主張的各級幹部下鄉固定一處進行長時蹲點調查的問題，次年1月3日，鄧小平也呼應毛澤東對之的批評

<sup>86</sup> 劉少奇，〈關於四清、五反蹲點問題的報告〉，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頁588。

<sup>87</sup> 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教授高華提供的觀點。(香港，2007.01)

<sup>88</sup> 例如：1964年8月16日，劉少奇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建議組織各級幹部參加「四清」、「五反」。劉也指出：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決定後，由書記處立即進行組織。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頁142。

指出：

方法問題很重要，我贊成主席的意見。我們一些大幹部，如中央局書記、省委書記蹲在一個小隊、大隊，太長了不一定有利。至少還要著眼一個縣，還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點的經驗並不一定全面。現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現在要慢慢上來管廣一些，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裏面出不來，就不好了。<sup>89</sup>

對於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主張與作法，毛澤東後來在其主標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批評為「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文革」爆發後、196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當論及其在「四清」「形左實右」錯誤的責任時，就表示他當時是「有些不同的意見」。1981年，銜鄧小平之命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鄧力群向王力表示，該決議中有關「四清」的部分，雖沒有明言，但存在指涉劉少奇在此運動中表現得比毛澤東還「左」的意思。<sup>90</sup>這可看作是鄧小平在事過境遷後仍不甚認同劉少奇當年在「四清」中的作法。

## 五、「文革」前劉、鄧在政治運作與往來上之互動情形

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在中共政治運作中的互動，雖有同在政治局常委會任事的同僚關係，劉也確實認為鄧是一言之有物、能一語中的的中央領導人。<sup>91</sup>然而，更突出的一面是，劉少奇與鄧小平在組織上可說是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關係的縮影。按中共「八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sup>8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70、1377。

<sup>90</sup>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34。

<sup>91</sup> 例如：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到安徽組對曾希聖「揭了蓋子」，他在發言中表示：「這次會議上主席講話和報告你們沒有很好學習，主席說沒有充分民主，就不可能集中，沒有充分民主，就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在講話中也說，要恢復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恢復老章程，這幾年把黨的老章程破壞了，要恢復起來。這些講話都要學習一下。」值得注意的是，會議期間中央常委中除了陳雲外都在大會上發言，劉少奇卻僅向皖省出席人員推薦學習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講話。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兩次講話〉，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頁233。

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鄧小平作中央書記處之首，劉、鄧的工作互動，即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但是，兩人在政治運作中也養成前者對後者信任、後者對前者尊重的往來模式。

### (一)劉少奇方面

劉少奇作為鄧小平的上級領導，有時針對特定問題，即會直接要求鄧小平與其麾下的中央書記處對此進行研議。例如：1962年5月10日的大區書記會議，針對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所提如何鞏固集體經濟的意見，劉少奇就指示：「子恢同志的一套意見，書記處研究後再議。」<sup>92</sup>劉少奇在地方視察期間就地予以指示時，也會要求當地領導將相關批示與文件同時寄給中央書記處，<sup>93</sup>供其在通盤考慮相關問題時參考。

按中共組織設計，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領導、管轄中央各部會。劉少奇也會批示鄧小平與書記處內分工負責書記督促管理相關事務的中央部門領導人，前去處理並執行。例如：1962年3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黨的監察工作情況反映》刊載的《青海省公安機關破壞法制違法亂紀情況十分嚴重》的材料上批示：「小平、彭真閱後，交謝富治同志辦。中央公安部應派人到青海去會同省委嚴肅處理。青海公安機關違法亂紀情況，應引為教訓。」謝富治時為中央公安部部長。另外，在「四清」運動期間，1964年9月3日，劉少奇致信鄧小平、彭真以及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指示「過去派到各地勞動鍛鍊的幹部，凡符合參加四清、五反者，一律由各地省委組織他們參加四清、五反。」<sup>94</sup>

從很多情況上可反映，劉少奇對鄧小平甚為信任、放手。在「一線」

<sup>92</sup>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69。

<sup>93</sup> 例如：劉少奇，〈就中央調查組關於《廣福公社天華、賽頭兩個大隊對機關幹部、軍官、職工等外出人員的家屬享受供給待遇情況的調查和意見》給張平化的批示(1961年4月24日)〉；〈就中央調查組《關於廣福公社天華大隊房屋情況調查和處理的意見》給張平化的信(1961年5月1日)〉，湖南省檔案館編，《情繫故鄉：劉少奇回湘檔案史料輯錄》，頁69-70。

<sup>9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下卷，頁550、602。

的決策過程中，劉少奇相當重視鄧小平提供的資訊，以作為其判斷形勢、擬定政策的依據。例如：後來由劉少奇親自「掛帥」的「四清」運動中，當劉少奇在評估運動情勢與進展時，即引述鄧小平去東北視察所聞為依據。1964年8月1日，劉少奇在講話中表示：

不論農村也好，城市也好，據我的估計，「四清」、「五反」多處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沒有搞開，沒有入門。鄧小平同志在東北走了一下，他講工廠的「五反」，他也說是沒有入門，根本沒有入門，還在門檻外邊。這就是說，過去一年多，我們在這個革命鬥爭中間打了敗仗，不是打勝仗。<sup>95</sup>

在「一線」的執行過程上，劉少奇對於負責具體部署的鄧小平所提出的對策方案，也多予以認可，甚至表示欣賞。例如：在中共準備將整風轉成「反右派」的緊鑼密鼓階段，1957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鄧小平關於整風鳴放情況和工作部署的報告。劉少奇肯定地表示：「小平同志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裡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sup>96</sup>

「大躍進」運動初期，毛澤東讓地方扮演推進運動的力量，但是當運動出現過熱與偏鋒的情況，毛澤東意想將之導正，就會請劉少奇與鄧小平出面與地方大員進行協調。運動步入難以為繼的階段，地方要員的士氣遠不若先前，甚至對中央指令消極以對，劉少奇與鄧小平又要奉毛之命疏通其思想、要之認識錯誤，再重新振奮志氣。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期間，劉、鄧就擔任此一任務。

劉少奇理論見長、擅於分析說理，同方面大員在檯面上進行溝通時，有其特點與優勢；鄧小平除了與劉少奇一道從中央的立場對地方領導人進行勸說、引導外，鄧也善用其豐厚人脈與社交手腕打破膠著局面，協助劉少奇「打通」地方領導人思想、達成中央交付之任務。根據與會的吳冷西的回憶：

<sup>95</sup> 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報告〉，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頁408-409。

<sup>9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97。

應該講小平同志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是他來自地方，過去和各中央局、省委的同志關係很熟，所以他利用這種關係來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思路，這個作用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央局和省委書記都住在北京飯店，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打台球，就在這個來來往往中間，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溝通了，這個作用是別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sup>97</sup>

有資料指出，劉少奇對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的表現與活動曾表示：「鄧小平工作也做了，休息也休息了，真是又會工作又會休息。」<sup>98</sup>這或是劉針對鄧以「勞逸結合」的方式說服地方大吏的表現，所給予的正面評價。

在「文革」前的中共的黨際外交，也可以看到劉少奇對鄧小平的工作佈置滿意的例子。1960年底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81國會議期間，據隨訪翻譯的回憶，中共代表團內的運作情形是：「一般小平同志向少奇同志報告會議情況怎麼樣，我們研究的對策怎麼樣，少奇同志基本上就是說可以，按小平同志定的去做。」<sup>99</sup>

鄧小平在「一線」內前列的工作，也非盡善盡美而無缺失之處，從目前可得的資料來看，劉少奇雖曾有過批評，但並未挑明鄧小平在其中的干係與責任。<sup>100</sup>

<sup>97</sup> 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頁320。

<sup>98</sup> 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編印，《鄧小平醜行錄》（北京：1967）。

<sup>99</sup> 〈閻明復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輯部，《話說鄧小平》，頁168。

<sup>100</sup> 例如：1962年11月12日，劉少奇批評中央組織部：「幹部管理不是管多了，而是管少了，不是管細了，而是管粗了。過去管了等於沒管，下面報來就是照批。比如青海xxx，副省長，就是中央管理的幹部，你們還不是批了嗎？安徽xxx、xxx、xxx，都是中央管理的幹部，都開除了黨籍，開除了那麼多的人，你們管了沒有管？還不是曾希聖管，中央並沒有管，也就是中央組織部沒有管。」劉少奇，〈對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頁299。劉少奇言論中對安徽所指的應是李世農與張愷帆，李、張皆在曾希聖去職後獲得平反。李、張在1958年與1959年分別被錯誤批判時，都身任該省的省委書記處書記。由於省部級的首要領導人的任免，須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審批；省一級書記處書記的任免，則是中央書記處權內許可之事。因此，李、張遭受懲處免職的決定報送中央，中組部審定後，最後仍須經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的批准。因此，劉少奇批評中組部對相關人事案「下面報來就是照批」，鄧小平連帶地也難

## (二)鄧小平方面

鄧小平對劉少奇甚為尊重，可從兩方面觀察：

一方面，鄧小平在其公開言行表述中，反映出其對劉少奇的敬重。例如：鄧小平在傳達、闡述黨中央指示或說明政策時，經常將劉少奇與毛澤東並列。例如：1962年11月29日，鄧小平表示：「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說，我們黨內不怕公開的反對派，怕搞鬼，搞陰謀。反對派總是有的，只要是公開的，就不怕。大家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樣就正常了。」<sup>101</sup>鄧小平在代表黨中央向下級作報告並予以指示時，也會傳達劉少奇對相關問題所提的意見與主張，要出席人員尤為重視並恪遵執行。前述的同一場合，鄧小平論及黨的幹部問題時表示：「最近，劉少奇同志批評，對幹部作鑑定很多年沒有搞了。組織部門應該建立這方面的工作。」<sup>102</sup>同樣是涉及黨的幹部問題，1966年2月26日，鄧小平在以「三線」建設為主題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和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當論及調派稱職幹部前去「三線」的重要性時，鄧小平引述劉少奇的話表示：「劉少奇同志說，要把最好的幹部、最政治掛帥的幹部派到礦山去。因為這方面上不去，其他方面到時候非停下來不可。」<sup>103</sup>

鄧小平在對當時現行政策有不同思考時，會引據劉少奇經點論著的要點，作為其立論的出發點，這在中共高層開始醒思「大躍進」失誤、並主要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時，表現得較為明顯。例如：1961年底，針對「大躍進」期間過多地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推動政策的作法，據鄧力群

---

辭其咎。另外，1960年初，在「大躍進」後期，鄧小平曾率中央書記處要員視察曾希聖主政下的安徽。鄧不但未發現異樣，反而稱許安徽相較於貧瘠的河南，經濟狀況猶屬小康，並稱讚曾希聖的領導有魄力。曾希聖的問題在「七千人大會」後期在劉少奇坐鎮下被揭發並被迫離職，鄧小平當初豈無走馬看花失察的責任？鄧小平或念於其與曾希聖之間的個人舊誼，並對其遭罷黜到西南轉任閑職有所惋惜，鄧後來特別過問曾的生活情況，囑咐其妻要注意照顧。

<sup>101</sup> 鄧小平，〈執政黨的幹部問題〉，《鄧小平文選》第1卷，頁333。

<sup>102</sup> 鄧小平，〈執政黨的幹部問題〉，《鄧小平文選》第1卷，頁330。

<sup>103</sup> 鄧小平，〈立足國防，搞好三線戰略佈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卷2，頁348。

回憶：「小平同志同時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說群眾路線是少奇同志在《論黨》裏加以闡述和發揮過的，是黨的根本路線，但是它的實現形式，大搞群眾運動只是一種形式，不是唯一形式。」鄧更進一步地指出：要靠經常工作，一點一滴的工作，要深入到群眾中去，認真聽取群眾的各種意見，同群眾一起商量各種問題的解決，踏踏實實、深入細緻是基本功，只大搞群眾運動，流於形式，會出來各種毛病。真正深入群眾，真正同群眾一起商量的，搞錯了，群眾會同我們一起糾正錯誤。<sup>104</sup>

另一方面，也可從鄧小平在「一線」內努力配合劉少奇，來觀察其對劉的尊重。

當劉少奇在「一線」內「當家作主」時，鄧小平在「一線」內擔負的是為劉少奇分憂解勞、過濾盤整的角色。鄧小平經手處理的文件比劉少奇多，劉少奇批轉鄧小平要之處理的文件，鄧又能極其有效率地以簡筆批示。<sup>105</sup>鄧小平在「一線」內深獲劉少奇的信任而有很大的自主權限，由鄧小平自行決定的事情，相較其上報劉少奇請示者還多。<sup>106</sup>但是鄧小平在對比較重要的情事「拍板」決定時，還是會特別注意劉少奇的可能意向與預期反應。因為在制度上，鄧小平與其中央書記處即便可以自主決定時，在議決後仍要備案，亦即將相關文件發送政治局委員，劉少奇可以藉此知情鄧小平與書記處的作為。劉少奇若對相關定案表態反對，乃可對鄧小平所做的相關決定覆議。為了預防或減少這種衝突情況的發生，即便劉少奇尚未或不會直接對此表示意見，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也會事先揣摩劉少奇的心意。事實上，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也保持很暢通的聯繫。針對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和劉少奇之間會透過電話先行商議與溝通。<sup>107</sup>

對於何事可由鄧小平單獨決定、何事其得要上報劉少奇，其中尺寸的拿捏乃是由鄧小平自己掌握。<sup>108</sup>當鄧小平將重要情事上報劉少奇(與政治局)

<sup>104</sup> 鄧力群，〈我為少奇說些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頁122。

<sup>105</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戊君)提供的資訊。(臺北，2009.07)

<sup>106</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7.01)

<sup>107</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8.04)

<sup>108</sup> 中國大陸的三名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丙君、己君)皆提供如此的資訊。(北京，

請示時，也會主動提出初步的意見供後者參酌；鄧小平會在相關文件上標寫「請少奇同志核示」的文字。<sup>109</sup>另外，鄧小平對於會繞過劉少奇而逕直向毛澤東呈報、請示的情況時，他也會很注意納入或轉達劉少奇的意見。這可從鄧小平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主持對蘇聯意識形態論戰的撰稿工作上找到例證。關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一文，鄧小平致信毛澤東表示：「主席：這是我們經過幾次修改的稿子，擬由劉周審閱後(15日)登出，遲了不好。文章很重要，希望你看看，給予指示。鄧13日午。」<sup>110</sup>亦即鄧在敦請毛審閱該稿時，也提出要讓劉少奇、周恩來過目，以吸受他們可能的意見。另一例可見：1962年12月29日，鄧小平將《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社論稿呈毛澤東審定，其在附信中表示：「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難得多，經過多次修改，搞成這個樣子。今天下午將在少奇同志處討論定稿。少奇同志意見，以在年底(31日)以前發表較好。請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天下午前給予指示。」<sup>111</sup>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當劉少奇與鄧小平等認為相關問題茲事體大，不是「一線」領導人可逕自議決之時，為以示慎重，劉、鄧會一同面告毛澤東並請之裁決。「文革」前長期參與中央機要的楊尚昆回憶：

毛主席在一段時間裡退居二線，委託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凡重大事情，少奇同志都請示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少奇同志常常這樣說：「我們這次討論，把意見拿來了，由我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會報，主席同意了，我們就開始執行，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我們下一次再討論。」他從不擅權、自作主張，十分尊重毛澤東同志。<sup>112</sup>

相關的例子可見：1962年2月，決定對經濟採行緊急措施並擬議成立新的中央財經小組的西樓會議結束後隔日，劉少奇、鄧小平即飛赴武漢請

---

2008.04)

<sup>109</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己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8.04)

<sup>110</sup> 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28。

<sup>111</sup> 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頁133-134。

<sup>112</sup> 楊尚昆，〈懷念少奇同志〉，《追憶領袖戰友同志》，頁60。



示人在該地的毛澤東。<sup>113</sup>然而，也曾發生過鄧小平將劉少奇與他自身等「一線」領導人共商的意見告知毛澤東時，後者不悅的情況。<sup>114</sup>

在「文革」前中共中央「一線」內，劉少奇與鄧小平有大量的公事往來：一起開會辦公、一道視訪部會指導，以及一同代表中共出訪或會見外賓。但是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卻相當地有份際。王光美就追憶劉、鄧之間「沒有私人往來」。<sup>115</sup>兩人之間的公私分明，一方面，乃因劉少奇的個性使然。劉少奇為人嚴肅、古板，不好與人相近，下屬平素也不太敢主動前去與之交談；<sup>116</sup>劉少奇在與人互動時多僅論公事、工作，不及其他，缺乏餘暇時的柔性往來與調劑。這種情形劉少奇雖有自知，但依舊如故。據王光美的追憶，早在「高饒問題」發生期間，「有同志給少奇提意見，說他接觸人不夠廣泛，和同志交往少，幹部有重要事才來找他匯報，小事就不來了。」事後，針對相關的批評意見，以及為了增加中共高級幹部之間正常往來與休息的機會，劉少奇特地與鄧小平商量成立一高幹俱樂部。然而，此俱樂部

<sup>113</sup> 鄧力群回憶：「關於西樓會議和毛主席的關係，這個事情我知道。作為少奇、小平，對毛主席還是很尊重的。西樓會議臨結束時，少奇同志在會上講，我們說了還不行，還要把這一套向主席匯報。主席同意，我們就照著執行；主席不同意，回來再議。所以西樓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少奇、總理、小平同志就飛抵武漢，將西樓會議通過的文件和中央批轉陳雲同志講話的批語送給主席看，聽取主席的意見。毛主席看了，他表示同意。第三天少奇同志從武漢回來，給我打電話，說：『主席同意啦。』高興得不得了。」〈訪鄧力群——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前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話說毛澤東——知情者訪談錄》，頁348。

<sup>114</sup> 例如：1961年3月，為討論農村問題，毛澤東在廣州召集中南、西南、華東的大區領導人在廣州開會；劉少奇、鄧小平等「一線」領導人在北京召集華北、東北、西北的大區負責人開會。在「三北」與「三南」會議各自進行的中途，毛澤東臨時決定將兩會合併於廣州。鄧小平代表劉少奇在內的「一線」領導人回覆毛澤東：「中央工作忙，是不是先把這裡會上討論的意見帶去。」對此，毛不快地表示：「那就開個分裂的會。」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220。

<sup>115</sup> 王光美，〈王光美談鄧小平〉，頁155。

<sup>116</sup> 1981年春，李先念即曾向劉源回憶其父親劉少奇：「少奇同志為人嚴肅，批評人很厲害，有時聲色俱厲，好嚇人！我們有時都有些怕他、躲他，不太好接近。但少奇同志也是最民主的，允許人家不同意他的觀點，允許辯論。因此，工作上遇到問題，都願意參加他主持的會議。特別是誰出了事情，犯了錯誤，又願意首先去找他。他從不整人，從沒有不求實地處理過哪位同志。」劉源，〈忠直坦蕩昭日月〉，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頁231-232。

部成立後，鄧小平是座上常客，劉少奇則仍是一直沒有去。<sup>117</sup>劉少奇這種在與人相處上過於孤僻自處的傾向，雖使之在中共高級幹部中樹立威嚴的形象，但是也易讓之與他人之間形成距離，不便與其交心，進而影響到工作上的開展。<sup>118</sup>對此，鄧小平也不無意見。有消息指出，鄧小平在 1960 年代即曾評論過劉少奇在與人相處上避俗。<sup>119</sup>

另一方面，在當時嚴禁派別活動的中共政治中，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的論公不涉私，甚有可能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與作為。因為劉、鄧兩人同在「一線」握有重權，雙方往來若超乎工作領域，甚有可能落人私組「黨派」之口語，尤其是他們必須得顧及極為敏感的毛澤東，以及他們各自的權力來源皆來自於毛個人的政治現實。因此兩人彼此之間在公務之外一直保持適度的距離。聊備一格的是，「文革」前，鄧小平對其他高幹的子輩後代，一向表現得不甚熱絡，有時甚至還有些不近人情，<sup>120</sup>然而，他倒曾熱情地對劉少奇之子所繪的童畫加以鼓勵、指點。<sup>121</sup>這多少或是顧及劉少奇的面子。

劉少奇與鄧小平彼此在正常的政治往來中就小心翼翼，劉與鄧在政治上更不可能合組所謂的聯盟與集團。「文革」爆發後，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與鄧小平在穩定局勢、防止混亂與支持所謂的「革命群眾」之間，處於很被動、甚至動輒得咎的局面。在毛澤東模稜兩可的態度下，工作組派遣的問題成為壓倒劉少奇與鄧小平的「最後一根稻草」。面對來勢洶洶的毛澤東，劉、鄧並無採取共同行動以自保。事實上，劉少奇與鄧小平政治命運的安排，只能聽從毛澤東的意念而發落，他們不能也不敢向毛澤東挑戰、抗衡。1966 年 11 月 3 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接見紅衛兵大

<sup>117</sup>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156。

<sup>118</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提供的觀點。(北京，2008.04)

<sup>119</sup> 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8.04)

<sup>120</sup> 中國大陸一名親身經歷者(庚君)提供的訊息。(北京，2008.04)

<sup>121</sup> 劉源回憶：「我從小愛畫畫，有時畫一些童子畫，送給毛主席毛伯伯、小平叔叔。他看完了以後很高興，還指點指點，這個應該怎麼畫，那個應該怎麼畫。我們家平反後，有一次我陪我母親去看小平叔叔，看了以後他沒有多說什麼，他說你是源源，我還記得，還跟小時候一樣，從小就是個好孩子，現在還畫畫嗎？他還記得那些事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頁275。

會の場合中，此時都已「靠邊站」的劉少奇與鄧小平進行兩人間的最後一次交談，而此時只能噓寒問暖、言不及義。<sup>122</sup>

然而，劉少奇與鄧小平在「一線」中的共事經驗與感受，對兩人關係仍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劉、鄧在「文革」中同時「中箭落馬」，但是兩人在被迫自我批評時，皆有意識地為對方著想。劉少奇針對其歷年的「錯誤」所作的檢討中，其中縱有鄧小平參與，劉卻隻字不提鄧。鄧小平也未「大難來時各自飛」，在其檢討中則勇於為自身也曾與聞的政策與劉分擔責任。

## 六、「文革」爆發後劉、鄧去職與區別待遇

1966年初，劉少奇曾兩度對其子表示：「只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另外，劉也曾向其子表示過其「退下來後，去教書，當林業教授」的心願。<sup>123</sup>然而，不是馬克思而是毛澤東，不但沒給他放手建設中國的機會，也無讓之有回歸平民生活、實踐退休計畫的可能。因為在同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劉少奇與鄧小平被指責派遣工作組在北京實施專政、鎮壓群眾，並被冠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罪名。劉、鄧在政治上由紅轉黑，任人擺佈、危在旦夕。

然而，劉少奇與鄧小平在之後卻受到區別對待而有截然不同的境遇。劉少奇不但被撤銷所有職務，更被指控為「叛徒、內奸、工賊」而被開除黨籍，<sup>124</sup>最後在非人道待遇下慘死河南開封。鄧小平在「大批判」下，長子被逼自殺成殘、自己也被謫貶江西數載，但畢竟「留得青山在」，繼續保留黨籍，留下其日後重新復出政治舞台的基本資格。劉少奇、鄧小平兩人何以會有不同的政治待遇？

首先、這主要取決於毛澤東個人的態度，尤其是其所認知的他自身與

<sup>122</sup> 在此一場合中，劉少奇問候鄧小平：「小平同志，怎麼樣？」鄧小平回說：「橫直沒事。」劉少奇說：「沒事，學習」。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411。

<sup>123</sup>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頁201-202。

<sup>124</sup>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1925、1927、1929年叛賣活動的主要罪證》（北京：1968.10.18），頁1-74。

劉少奇、鄧小平關係的不同。如前文所述，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是屬於「政治同盟」性質的關係，雖有主副，但仍屬平起平坐的同一輩份。以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及其積聚的人望，毛澤東對劉較為忌憚，一旦對之心生敵意，問題的性質就更易轉化為「敵我矛盾」。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則屬於「政治扈從」性質的關係，毛對鄧長期提拔與觀察，鄧的表現到「文革」前夕與初期雖讓其不滿意，但毛對屬於年輕一輩的鄧還是有較高的容忍度，也仍抱有「孺子可教也」的期望。另就劉、鄧各自擁有的能力特質與政治影響，毛認為鄧在治理黨國的工作能力上，可堪與劉相比；<sup>125</sup>鄧多年在中共黨內所形成的人脈關係，既多與劉重疊而可取代之，其與軍隊的聯繫更是劉所無。因此，毛在決定將鄧與劉一併打倒時，對鄧還是網開一面，冷藏備用。

其次、劉少奇與鄧小平各自在「一線」的所處位置與對應毛澤東策略的不同。劉少奇與鄧小平雖然同在「一線」負責工作，並且保持信任一尊重的善意互動，但是兩人的關係中仍含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劉少奇在「一線」內是首要的領導人，鄧小平職位較低，對之有聽命、服從的義務。劉少奇與鄧小平以「一線」正副領導人的身份指導工作時，相較於劉的暢所欲言、有時甚至好「極而言之」而惹塵埃，鄧則較為謹言慎行。<sup>126</sup>因此，「一線」的領導發生嚴重錯誤，自毛澤東看來，領頭為首的劉少奇，自應負起最主要責任；相對之下，「埋頭拉車」的鄧小平責任則較輕，而且其之如

<sup>125</sup> 1967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同王力談話時表示：「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解放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出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掌舵，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王力，〈毛澤東談鄧小平和我對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看法〉，《王力反思錄》上冊，頁319。

<sup>126</sup> 1967年2月17日，周恩來就表示：「劉、鄧兩人正好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劉說的話多，鄧就不大說，鄧是事情愈少愈好，你找他的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話少呀，找他的錯話也找不到多少呢。」〈周總理接見財貿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頁96。對於劉少奇說話的方式，王力的觀察是：「他的缺點是有很大片面性，強調一個問題時不顧其他，為了引起人們重視，把話說得很絕。總理就說得很周到，少奇同志就常說過了杠。」王力並認為江青將劉一些出格的話如：毛澤東主張的調查方式「過時了」。向毛告狀，從而惡化了毛劉關係。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46-747。

此，也有中央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負責具體部署的規定的因素。

劉少奇與鄧小平在回應毛澤東對「一線」工作的質疑或批評時，也存在策略上的差異，這多少也對毛澤東在後來看待兩人問題的性質上產生影響。劉少奇行事比較直接，特別是其自認是心中有數、擇善固執的時候，而這又可能會引發或加重毛澤東對權威與權力的敏感，而使問題更趨複雜化。鄧小平對毛澤東採取的策略則是避其鋒、減少接觸。

以「文革」初被毛澤東批判的「1962年的右傾」為例：毛澤東因「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倡議在中共高層蔓延散佈，以及對形勢悲觀評估的問題，而對「看家」的劉少奇大表光火，劉在動氣情急之下，居然當面以「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回應毛對之的責難，直到兩人氣消冷靜；<sup>127</sup>鄧小平在聞曉毛澤東在相關問題上的態度與立場後，不但迅速改變原先立場，還緊急地要下屬收回其先前以「黑貓、黃貓」比喻支持「包產到戶」的言論。<sup>128</sup>在「形勢比人強」下，劉少奇、鄧小平兩人雖然都不約而同地跟上毛澤東批判「單幹風」，但是仍可辨析兩人在應對毛澤東時的殊異。

鄧小平在此次風波後，便鮮對重大政策主動表態，也有意地減少對政務的參與，連帶地縮減其與毛澤東直接接觸以至冒犯的可能。<sup>129</sup>鄧小平這種對毛選擇避走的策略，難以逃脫毛澤東的「法眼」。毛澤東在「文革」時就不滿地表示「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然而，不同於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躲為上策」，劉少奇在扭轉「三年困難」上在黨內所建立的威信與從中積

<sup>127</sup> 據劉源回憶，劉少奇曾對其表示：1962年7月上旬的一日，劉少奇欲向正在游泳的毛澤東問候請示時，在泳池內的毛即質問劉：「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毛上岸後，劉對毛表示：「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不客氣地回應：「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也動了情緒表示：「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劉源、何家棟，〈可貴的嘗試〉，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頁49。

<sup>128</sup> 胡克實，〈胡克實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編，《話說鄧小平》，頁163。

<sup>129</sup>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3), xxxviii-xxxix.

累的信心，再加上在摸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程中，其自認頗有心得，<sup>130</sup>在中共高層就此進行討論時，竟擦槍走火地引發其與毛澤東之間對運動看法的爭執；劉少奇在指揮此運動的過程中展露的對各級領導人的權威，亦著實讓毛澤東吃驚與吃味，<sup>131</sup>更直接讓他下定撤換劉作為其接班人的決心。

此外，劉少奇與鄧小平在「文革」逼人形勢下被迫檢討，較諸劉少奇，鄧小平在言行上較為能屈能伸，或多少也對毛澤東對兩人抱有不同的態度與觀感產生影響。<sup>132</sup>

## 代結論：鄧小平對劉少奇平反與評價問題之作為與立場

毛澤東離世、「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又再度重返中共政壇，並逐步地重掌大權。鄧小平也不忘注意在「文革」中慘遭無情鬥爭與殘酷對待的劉少奇及其家屬。在劉少奇平反問題尚未提出的1977年，當時主持文化教育工作的鄧小平，不但批准其子劉源要求報考大學的陳情信，在錄取問題上也有批示，讓之順利入學。<sup>133</sup>對於劉少奇本人歷史重議與名譽平反問題，

<sup>130</sup> 例如：對於王光美用數小時宣講其調查所得的「桃園經驗」，毛澤東表示：「這個學問就那麼大？什麼問題講5個鐘頭還講不完！」其他幹部對此也有些意見。楊尚昆向劉少奇反映相關的輿論，更對劉表示：「你從來對你的夫人要求嚴格，為什麼這次讓她到處講話呢？」劉回覆楊：「這也沒有辦法，誰讓人家手裡掌握第一手材料呢。」蘇維民，〈聽楊尚昆談四清運動〉，《百年潮》，第10期（北京：2007），頁17。

<sup>131</sup> 劉少奇要求省級領導赴基層蹲點，否則將受罷官懲處，後者不敢不從，紛紛下去。對此，毛澤東對楊尚昆表示：「還是少奇厲害！我說了多次叫省委書記下去，他們就是不動。少奇一罵，他們就下去了。」蘇維民，〈聽楊尚昆談四清運動〉，頁17。

<sup>132</sup> 例如：1967年中南海內曾組織對劉少奇、鄧小平的面對面批鬥。「造反派」本來即來意不善地計劃採取激將的方式對付劉少奇，劉面對來勢洶洶的詰問態度強硬、不願屈服，「造反派」趁機鬧事，甚至用「毛語錄」搥打劉的臉頰與身體。鄧小平在面對「造反派」的威逼時，則較為靈活地表示：「你們說是反革命，那就是反革命吧！」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76。鄧小平在「文革」後期又受到批判時，毛澤東曾將鄧小平與劉少奇、林彪自我檢討的態度加以比較。1976年1月21日，毛澤東表示：（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少奇）、林（彪）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意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臺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頁426。

<sup>13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頁275。

鄧小平也開始動作：鄧既讓高層知曉民間有要求平反劉少奇的聲浪，也下令中央組織部研究此案；<sup>134</sup>鄧不但在對平反劉少奇問題有所抵制的高幹在場的政治場合中，技巧地向王光美起身致意並與之握手的方式，對尚未恢復名譽的劉少奇表達敬意；<sup>135</sup>他在對外賓講話時，也表示當初加諸劉少奇身上的罪名皆屬不實，為劉需要平反一事製造輿論；<sup>136</sup>鄧小平也撥冗關心有關劉平反問題的宣傳與解釋工作。<sup>137</sup>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為劉少奇主持追悼大會，鄧小平出席並親致悼詞，算是為其「文革」前同在「一線」內的上級暨戰友，獻上最後的同志情。對於劉少奇平反問題的最終取得成功，說話向來簡練的鄧小平在會中向王光美表示：「是好事，是勝利。」<sup>138</sup>王光美對於鄧的話的解釋是：「為什麼是好事，就是說從國家來講，最大的冤案敢於給平反，這不是好事嗎？另外是勝利，對誰勝利，對林彪、康生、『四人幫』，我們是勝利了。」<sup>139</sup>劉少奇的家屬對於鄧小平在平反劉的問題上的主導作用與辛勤努力，甚為感戴，表示永誌難忘。<sup>140</sup>

鄧小平在平反劉少奇、重新肯定劉在中共黨史中應有的歷史地位的問題

<sup>134</sup> 1978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一封要求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來信上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中組部研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458。

<sup>135</sup> 王光美，〈王光美談鄧小平〉，頁158。

<sup>136</sup> 例如：197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時事通訊社代表團，在回答關於中國是否打算恢復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名譽問題時指出：「過去給劉少奇加的罪名不實。叛徒，現在材料證明沒有這回事；工賊，沒有這回事；內奸，也沒有這回事。這些問題都要實事求是，在適當的時候作出正確的結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515。

<sup>137</sup> 1980年4月26日，鄧小平閱《人民日報》社論《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一論為劉少奇同志平反》送審稿，作出批示：「退喬木同志，我看好，改了幾個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625。

<sup>138</sup>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441。

<sup>13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頁257。

<sup>140</sup> 王光美深信劉的平反，「起決定作用的」是鄧小平，「因為他敢於堅持真理」。為劉少奇平反一事，王表示：「小平一個字都沒有談到他個人，從沒有說過他給少奇平反做了多麼艱苦的工作，又碰到多少困難，我也沒聽任何人傳達過。」「自從少奇平反以後，我們家裡有一個共識，要尊敬小平同志，但是誰都不許麻煩他。」「我和孩子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幫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頁256-257。

題上，也特別留心於重審劉個人歷史的現實意義。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鄧小平主導下的中共中央對毛澤東時期的施政與作為，進行大規模的改弦易轍，在國內、外引發了中共是否會「非毛化」、全盤否定毛澤東的議論。鑑此，鄧小平堅持在對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加以揚棄的問題上，必須採取「一分为二」的方針：將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放在首位，堅稱「毛澤東思想」是以毛為首的中共領導人的「集體智慧結晶」，黨的後繼者對之要繼承、豐富並發揮；對於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要正視不諱，並呼籲全黨引以為戒、莫要重蹈覆轍。對劉少奇身後加以評價與定位的問題，自也必須為此一評毛方針服務。

首先、鄧小平明指劉少奇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成熟與發展作出主要貢獻者之一，<sup>141</sup>以突顯「毛澤東思想」的桂冠榮耀非毛一人所專屬，是中共集體的資產。這面政治旗幟不會因毛晚年的思想與作為遭到批判而連帶地被否定。其次、由於劉少奇乃是毛澤東晚年言行惡劣影響的主要受害者，不具體分析劉身前的歷史，或過度地為死者諱，則易可能造成「劉對、毛錯」的二元簡單印象。毛澤東因其晚年錯誤本已難堪的歷史地位與評價，更會因此有積重難返、被徹底毀損之虞。如此發展下去，毛澤東建國之大功，恐還不抵其治國之大謬，將毛功績置於首位的基調，也就難以成立了。因此，鄧小平除了要劉少奇對中共歷史中可歌可泣的部份一起頂功，也要他為中共歷史中導致「文革」慘劇的部份一同分責。

前文曾提過的鄧小平以「沒有反對」、「頭腦發熱」，評論劉少奇對毛澤東倡議推動的「大躍進」的態度；鄧小平在《歷史決議》中以隱筆的方式，暗指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比毛澤東還激進；在中共中央討論關於劉少奇平反的官方決議內容時，鄧小平也堅持寫上劉也犯過錯誤的字句。<sup>142</sup>鄧小平這種對劉少奇的歷史所主張的「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

<sup>141</sup>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頁311。

<sup>142</sup> 1980年2月28日，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各組召集人匯報會。在討論中有人提出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要不要寫劉也犯過錯誤的問題，鄧發表意見說：「今天倒是議了一個重要原則問題。實事求是可不容易。寫上這樣的語句不會給人們說這是貶低少奇同志，不可能這樣理解。少奇同志與一般人不同，在給他作的平反決議中如果沒有這樣的內容，會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所有錯



的立場，除了因為他本人在「文革」前與劉少奇在「一線」朝夕相處，對劉的歷史可說是知根知底，具有他人無法相比的發言權；也基於鄧小平對現實政治需要的構想：要早已撒手人寰十餘年的劉少奇發揮政治「餘熱」，為毛澤東做最後一次的「保航護駕」，讓毛順利地被高高供奉在刻載中共官方信仰與榮蹟的神龕上。

---

誤都是毛主席一個人的。這不是事實。我們犯的錯誤比少奇同志犯的錯誤多。總要承認他也有錯誤就是了。這也是個黨風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604。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檔案史料

1.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北京，1967。  
*Ren min chu ban she zi liao shi, bian. Pi pan zi liao: Zhongguo He lu xiao fu Liu Shaoqi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yan lun ji.* Beijing, 1967.
2.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1925、1927、1929年叛賣活動的主要罪證》，北京，1968.10.18。  
*Zhong yang zhuan an shen cha xiao zu. Pan tu, nei jian, gong zei Liu Shaoqi de zui zheng: 1925.1927.1929 nian pan mai huo dong de zhu yao zui zheng.* Beijing, 1968.10.18.
3. 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近代革命研究所編印，《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匯編》，北京，1967。  
*Zhongguo ke xue yuan ge ming li shi yan jiu suo, jin dai ge ming yan jiu suo, bian yin. Liu Shaoqi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yan lun hui bian.* Beijing, 1967.
4.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北京，1967。  
*Beijing di zhi xue yuan dong fang hong gong she, guo jia ce hui zong ju er fen ju ji suan dui, fan yin. Wu chan jie ji wen hua da ge ming yun dong zhong shou zhang jiang hua xuan bian.* Beijing, 1967.
5. 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編印，《鄧小平醜行錄》，北京，1967。  
*Hong dai hui qing hua da xue jing gang shan bing tuan, bian yin. Deng Xiaoping chou xing lu.* Beijing, 1967.
6. 首都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南海長城》戰鬥隊編，《三審大扒手王光美》，北京，1967。  
*Shou dou hong dai hui qing hua da xue jing gang shan bing tuan Nan hai chang cheng zhan dou dui, bian. San shen da pa shou Wang Guangmei.* Beijing, 1967.
7.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毛澤東思想萬歲》，臺北，1974。  
*Guo ji guan xi yan jiu zhong xin, yin. Mao Zedong si xiang wan sui.* Taipei, 1974.

8. 湖南省檔案館編，《情繫故鄉：劉少奇回湘檔案史料輯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Hunan sheng dang an guan, bian. *Qing ji gu xiang: Liu Shaoqi hui xiang dang an shi liao ji lu*.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1998.
9. 劉少奇，《在北京各界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Liu, Shaoqi. *Zai Beijing ge jie qing zhu shi yue she hui zhu yi ge ming si shi zhou nian da hui shang de jiang hua*.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57.

## (二)回憶史料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話說毛澤東——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di yi bian yan bu, bian. *Hua shuo Mao Zedong: zhi qing zhe fang tan l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0.
2.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2000。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di er bian yan bu, bian. *Hua shuo Liu Shaoqi: zhi qing zhe fang tan l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2000.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di san bian yan bu, bian. *Hua shuo Deng Xiaoping*.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4.
4.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臺北：地球出版社，1993。  
Mao mao. *Wo de fu qin: Deng Xiaoping*. Taipei: Di qiu chu ban she, 1993.
5.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臺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  
Mao mao. *Wo de fu qin Deng Xiaoping: "wen ge" sui yue*. Taipei: Shuang da lu you chu ban she, 2000.
6.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Wang, Li. *Wang Li fan si lu, shang juan*. Hong Kong: Bei xing chu ban she, 2001.
7. 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Wang, Guangmei, Liu Yuan, deng zhu, Guo Jiakuan, bian. *Li shi ying you ren min shu xie: ni suo bu zhi dao de Liu Shaoqi*. Hong Kong: Tian di tu shu you xian gong si, 1999.

8. 吳冷西，《回憶領袖與戰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Wu, Lengxi. *Hui yi ling xiu yu zhan you*. Beijing: Xin hua chu ban she, 2006.
9.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Li Yueran. *Zhong su wai jiao qin li ji: shou xi e yu fan yi de li shi jian zheng*. Beijing: Shi jie zhi shi chu ban she, 2001.
10.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Li, Rui. *Da yue jin qin li ji, xia juan*. Haikou: Nan fang chu ban she, 1999.
11. 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Cui, Qi. *Wo suo qin li de zhong su da lun zh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9.
12.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Zhang, Xiushan. *Wo de ba shi wu nian: cong xi bei dao dong bei*.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2007.
13.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第3期(北京，2009)，頁29-36。  
Zhang, Peisen, zheng li. "Yang Shangkun 1986 nian tan Zhang Wentian yu Mao Zedong," *Yan huang chun qiu*, 3 (Beijing, 2009), 29-36.
14.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Huang, Zheng, zhibi. *Wang Guangmei fang tan l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6.
15.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Yang Shangkun. *Zhui yi ling xiu zhan you tong zhi*.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1.
16. 赫魯曉夫，李文政、王君如等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上冊，武漢：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  
He lu xiao fu; Li Wenzheng, Wang Junru, deng yi. *Zui hou de yi yan: He lu xiao fu hui yi lu xu ji, shang ce*. Wuhan: Zhong guo guang bo dian shi chu ban she, 1988.
17.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Zhao, Jialiang, Zhang Xiaoji. *Ban jie mu bei xia de wang shi: Gao Gang zai Beijing*. Hong Kong: Da feng chu ban she, 2008.
18.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Liu, Zhende. *Wo wei Shaoqi dang mi sh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3.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Bo, Yipo. *Ruo gan zhong da jue ce yu shi jian de hui gu*, shang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7.
20. 蘇維民，〈聽楊尚昆談四清運動〉，《百年潮》，第10期(北京，2007)，頁11-19。  
Su Weimin. "Ting Yang Shangkun tan si qing yun dong," *Bai nian chao*, 10 (Beijing, 2007), 11-19.

### (三)年譜、日記、文集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Liu Shaoqi nian pu (1898-1969)*, xia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6.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ou Enlai nian pu (1949-1976)*, shang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7.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Deng Xiaoping nian pu (1975-1997)*, shang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4.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Chen Yun nian pu*, zhong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0.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卷2，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Zhongguo ren min jie fang jun jun shi ke xue yuan, bian. *Deng Xiaoping jun shi wen ji*, juan 2. Beijing: Jun shi ke xue chu ban she,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4.
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Mao, Zedong. *Mao Zedong xuan ji*, juan 5.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77.
7.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Yang, Shangkun. *Yang Shangkun ri ji*,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1.
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Deng, Xiaoping. *Deng Xiaoping wen xuan (1975-1982)*.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3.

9.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Deng, Xiaoping. *Deng Xiaoping wen xuan*, juan 1.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4.

#### (四)研究專書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Liu Shaoqi zhuan*,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ou Enlai zhuan*, xia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1.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Mao Zedong zhuan*,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3.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Bai nian Xiaoping*. Beijing: Xin shi jie chu ban she, 2004.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Chen Yun zhuan*,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5.
6. 林蘊暉，《國史笥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Lin, Yunhui. *Guo shi zha ji: shi jian pian*. Shanghai: Dong fang chu ban zhong xin, 2008.
7.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Zhang, Suhua. *Bian ju: qi qian ren da hui shi mo*. Beijing: Zongguo qing nian chu ban she, 2006.
8.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Guo, Dehong, Lin Xiaopo. *Si qing yun dong shi lu*. Hangzhou: Zhe jia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5.
9. 陳野蘋、韓勁草，《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Chen, Yepin, Han Jingcao. *An Ziwen zhuan lue*.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 she, 1985.
10. 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2001。  
Feng, Zhijun. *Liu Shaoqi yu Mao Zedong*. Hong Kong: Huang fu tu shu, 2001.
  11.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Peng Zhen zhuan bian xie zu, Tian Youru. Peng Zhen zhuan lu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12.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  
Liu, Yuan. *Liu Shaoqi yu xin Zhongguo*. Hong Kong: Da feng chu ban she, 2005.
  13. Bachman, Davi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 Baum, Richard.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15. 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 Li, Tien-min. *Liu Shao-ch'i: Mao's First Heir-apparent*,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5.
  17.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18.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3.
  19.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 (五)期刊論文

1. 鍾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4期(臺北，2007.12)，頁87-116。  
Chung, Yenlin. "Deng Xiaoping'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7," *Zhongguo da lu yan jiu*, 4 (Taipei, 2007.12), 87-116.
2. Teiwes, Frederick C.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July, 1995), 55-94.

## (六) 論文集論文

1. 傅伯言、余伯流，〈鄧小平與中央蘇區的反「羅明路線」〉，收入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鄧小平百週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Fu, Boyan, Yu Boliu. “Deng Xiaoping yu zhong yang su qu de fan ‘Luo Ming lu xian’,” shou ru quan guo Deng Xiaoping sheng ping he si xiang yan tao hui zu zhi wei yuan hui, bian, *Deng Xiaoping bai zhou nian ji nian: quan guo Deng Xiaoping sheng ping he si xiang yan tao hui lun wen ji*,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5.
2.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The Politics of an ‘Un-Maoist’ Interlude: The Ca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1956-1957,”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7.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Shaoqi and Deng Xiaoping, 1952-1966**

Chung, Yen-lin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ad of State and first Party Vice-Chairman, Liu Shaoqi and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Deng Xiaoping, were both in Mao Zedong's good graces, and entrusted by him to handle the Party centre's daily affairs. Mao was a crucial factor affecting Liu and Deng's interaction. Deng showed respect and support for Liu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that Liu was Mao's successor; Liu also highly valued Deng due to 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Mao. In most cases Liu and Deng had similar views of importa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cies, and would follow Mao without hesitation when he expressed his views explicitly. Liu and Deng worked together to successfully figure out ways to cope with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at occurred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owever, there was some important but easily overlooked divergence between their ideas about how to run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Nevertheless, within the so-called First Front leadership, Liu and Deng had a good mutual working relationship resulting in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despite their superior and subordinate status. In addition, although Liu and Deng were purged simultaneousl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treated them in very different ways. Deng was much luckier than Liu who was not only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but also persecuted to death.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fates may be related to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First Front and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they adopted when they interacted with a suspicious Mao.

**Keywords: Liu Shaoqi,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Two-Front Arrangement, Chinese Elite Politics**

